



国防大学 2 071 3158 4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8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	何柱国(1)
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	王维城(30)
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	于立言(43)
国民军倒曹之真相	李仲三(46)
冯玉祥北京政变中的一幕	张俊声(50)
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	何 遂(56)
关于李景林与国民军	韩玉辰(68)
我在张、吴合作中的亲身经历	苏锡麟(72)
我被国民军逮捕和脱走的经过	曾毓雋(78)
国民军南口战役亲历记	张樾亭(88)
我随奉军参加南口战役之回忆	郭希鹏(101)
阎锡山参加直奉反冯的经过	周 玳(109)
奉晋两军涿州之战	岳 超(123)
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在甘肃	张寿龄(130)
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	张宣武(144)
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	陶尚铭 关根勤(155)
松室孝良和冯玉祥的一段关系	吴锡祺(165)

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	于学忠(171)
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	魏益三(191)
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郑廷玺(223)

质疑·补充·订正

关于肃顺职位和处死资料的订正	孟 和(238)
对《齐卢之战纪略》的补正	严宽甫(239)
关于《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和《齐卢之战纪略》 的订正	蔡一鸣(240)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 杰(242)
对《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的订正	邓汉祥(243)
关于孙中山、段祺瑞会晤的更正	陆丹林(244)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

何柱国

一 酝酿期间

从曹、吴倒段说起

我这里说的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就是人们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它的特点不仅在于战争的范围几乎牵涉到全国各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有南方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的参预。这一战役，我除了在作战期间担任奉军一、三联军作战科主任之外，还在酝酿期间参预了某些方面人物的接待，因此不但军事方面知道一些情况，而且政治方面也有过一些接触。不过事隔多年，有的已经忘怀，有的记忆不清。现在就就我所能回忆得起而且确信无疑的一部分材料写出来，作为文史工作部门的参考资料。

1920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得以亲奉的梁士诒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一时无可如何，因此乃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奉军失败之后，退缩到山海关外，整军经武，力图报复，自不待言。曹、吴战胜之后，一面恢复旧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贿选曹锟为总统；同时由吴佩孚坐镇洛阳，实行武力统一。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内尚未为曹、吴所吞并且敢与曹、吴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之外，只剩下南方孙中山所领导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力量，和

孤立在华东一隅的段派残余浙江的卢永祥及上海的何丰林。曹、吴实行贿选，全国哗然，于是国会中拒贿的议员相率南下，成立非常国会，因此有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统率的北伐之师。孙中山的北伐，虽因内部混乱而遭受挫折，但至1924年春声势复振，乃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矛盾，与北方反对曹、吴的各方面遥相呼应，共同对付曹、吴。至于段祺瑞，自1920年被曹、吴推倒以后，从未忘怀东山再起，加上始终忠心于段的卢、何又处在苏、皖、赣、闽四省曹、吴势力的包围之中，岌岌可危，因此凭他北洋首脑的身份，四面八方拉拢关系，拼凑实力，积极策动推翻曹、吴。孙、段、张联合打倒曹、吴的形势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每一军阀都有他的国际背景，因此每一次内战，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插手其中，打倒曹、吴之役，当然也不例外。大家知道，当时曹、吴走的是英、美路线，段、张走的是日本路线。段祺瑞在天津日本租界内用以与各方联系的电台，就全部是日本代为架设。我们在前线作战的紧要关头，也曾收到过段氏由这电台发来的头等重要的军事机密情报，影响战局甚大（详后）。

奉军的整军经武

1922年奉军战败退缩到山海关外之后，积极整军经武，卓有成效，这不但是1924年打倒曹、吴的张本，而且奠定了以后整个东北军的基础，就东北军建军的历史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个人正在奉军开始整军经武的时候投身进去，而且参预了这一工作几乎全部的过程，因此只要把我自己所见所闻和所作的一切交代清楚，就不难窥见当时奉军怎样整军经武的一个梗概。

1919年我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国之后，担任保定军官学校队长之职。保定军校历任校长，从第一任蒋方震起，直到孙树林为止，都是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曹、吴得势之后，改派张鸿绪为校长。张是北洋老武备出身，接任校长后，有意排挤士官一派，因小过开除了士官派的戴联玺和杨正治，激起风潮，结果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

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琪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我也是去东北的一个。

当时奉军以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和郭松龄等为核心，大事招兵买马，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他们吸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招揽进去。我个人就是通过当时在三、八旅中充任炮兵团长的日本士官同期同学邹作华的关系而被招揽的。我选定去东北这条路，当时除了同学援引之外，自己有三个目的：第一，我学的是骑兵，认为去东北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第二，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有带兵的机会。这第三个目的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我记得1923年我从东北回到北京结婚时，我的叔岳父贾德耀^①对我说：“你在东北是个中校，如果愿意转到冯的方面来，可以立即升为上校。”问我意下如何？我就直截了当地以在东北有机会带兵，而冯的方面无此机会为词回绝了他，并且得到他的谅解。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奉军的招兵买马究竟是为的什么，凭的什么，去东北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为什么去的。

我是1922年7月到东北的。一到东北，仅由三、八旅的副官长高纪毅接待，还没有见到过统帅部的任何主要人物就被分配在当时的陆军东北讲武堂担任教官兼队长之职。我任职之后，慢慢地摸清了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和整军经武的具体内容，今就记忆所及，概

^① 我的岳父是贾德耀的胞兄，早死，我妻由贾抚养长大，视同亲生，故称叔岳父。他是冯玉祥的把兄弟。冯玉祥给我证婚。

述于下。

首先，我要谈谈奉军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杨是东北法库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负责，从1918年继张作相为统帅部的总参议，始终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杨宇霆先后吸收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耿翼翹、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新军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壮大，终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军的主体。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22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升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

其次谈谈整军经武的重要机构和重要的人事部署。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

这里。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麟春和参谋长张学良。第二个重要机构是陆军东北讲武堂。这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由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并由中、日两个陆大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名义代张学良负责，下面的教官和队长就是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二十余人为中心的。我个人也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第三个重要机构是三、八旅整编的二、六旅。三、八旅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役损失甚重，整编为二、六旅后，不但人员枪械补充齐全，而且官兵都经过挑选，装备又全部是最新式的，所以把它作为全军的示范部队，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无论整编前的三、八旅或整编后的二、六旅，两旅都是不分家的，并且一直都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以后郭松龄倒戈，妄想取代张氏的地位，他凭的就是这个资本。第四个重要机构是东北兵工厂。这厂由杨宇霆兼任督办，早已设立，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规模不大，以后则大事扩充，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造山炮、野炮，尤其是增设了一个八二口径的迫击炮厂，炮筒皆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改装，价廉物美，后来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最后一个重要机构是东北航空队，由张学良主管。东北航空队原由1920年倒段之役瓜分段派的空军而来，但以后东北航空队改用了欧战以后法国的最新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是法国的，而曹、吴的飞机则仍旧是段派遣留下来的陈旧之物，没有什么刷新。此外还有训练军士的教导队和吉、黑两省轮训旧派军队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等，不必细述。

再次谈谈军事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重要措施之一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我

也就是凭了这一条后来得到带兵机会的。此外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因此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最后还不能不提一提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形。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曹、吴对抗，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呢？原来东北农产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大豆出口，因此经常是一个出超的地区。奉军就是凭了这个出超的条件，加上自己在东北的政治淫威，发行了一种不兑换的奉票，这种奉票起了很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可兑换的纸币，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等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不能稳定。可是发行不兑换的奉票，虽然也要出超这个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当然不是没有限制）。东北的财政能够承担那样巨额的支出，秘诀就在这里。此外还要提到一件事。大家知道，奉军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互相矛盾又互有勾结的。东北的财政经济有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呢？我没有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不敢下断语。

以上就是奉军整军经武的梗概。奉军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工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孙、段、张的结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张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即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进行结合。

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

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关于姜、谭互派信使和韩麟春的广州之行，详情我已记忆不清。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分述如下。

汪精卫是1923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当时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伍朝枢是1924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预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说广东话，经常都是由我陪他见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军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军事机构的认真细致和不厌其详地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看来，估计他此来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

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作战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到、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问我:“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心里很奇怪,觉得他问起别的都很内行,独有这一问,却问得没来由。因为,老实说,当时绝大多数的奉军官兵,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毫无所知的,哪里谈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没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的问话很严重,但我话已说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自己的见解。我大意是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枢听了我的解释,紧皱着眉头,不发一语。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有什么大错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

以上就是有关孙、张结合的一些片断。这当中关于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和孙中山先派汪精卫北来,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检出。当时我们检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在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

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起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1. 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 台绥

孙 文 九月二十二日

2. 谭延闿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具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 勋安

弟谭延闿启 三月十六日

（超六是姜登选字。成济安，湖南人，曾为北京世界日报记者。余人来悉）

至于段、张的结合，我直接的接触甚少，不过就当时奉军一般上层干部所能得知的情况，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

张作霖原是袁世凯底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所以段、张的关系本是北洋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从头到尾是个亲日派，奉张也是亲日的，所以在对日的关系上，段、张早已成为好搭档。不过在对内的派系斗争中，段、张的进一步亲密，则是起源于1918年秦皇岛的劫械。那时段派正在大事扩充实力，特别是徐树铮正在大搞其西北边防军。而段的政敌冯国璋也不示弱，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军队。恰好冯国璋从国外购进一批军械，将在秦皇岛卸下，事为徐树铮所侦知，乃以日本士官同学关系跟杨宇霆秘密商议，议定由奉军派兵去秦皇岛劫械瓜分。结果劫械成功，平分了解械，从此段、张成了亲密的伙伴。1920年曹、吴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濒临倒台的时刻才进军关内，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参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曹、吴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将全部落入曹、吴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将为曹、吴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见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张之间即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给段四而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成吴光新，联冯的主将则是我的亲戚贾德耀。我所知道有关段派的一鳞半爪，很多就是由贾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间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许世英。

二 作战经过

浙沪联军打响第一炮

反直之战，最后打败曹、吴的是我们奉军，但第一炮是段派的卢永祥和何丰林的浙沪联军打响的，浙沪联军和孙中山的北伐军

起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因此在说到直、奉两军的决战以前，不能不先简单扼要地提一提浙沪联军和北伐军。

1924年9月初，卢永祥一面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我还记得很清楚，卢永祥打响第一炮的第二天，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并且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第三天孙中山也就发表宣言，宣布即日移师北指。可见孙、段、张的联合早已成熟，军事方面也早有成议。我们奉军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

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段派嫡系，始终拥段，要算是段派的最后一点实力。因此以齐燮元为首的苏、皖、赣、闽四省的曹、吴势力步步进迫，必欲去此眼中之钉。而段氏也正为此更加积极地四面八方策动反对曹、吴。当时齐燮元和孙传芳等借口反对卢、何扩充军队，从苏、皖、赣、闽四面进兵压迫，由此点燃战争之火。苏、皖、赣、闽四省的军队原已很多，加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的军队又源源南下援苏，卢、何孤悬华东一隅，众寡不敌，原难持久，所以战事从9月初旬开始，至10月中旬，即以卢、何的失败而告结束。后来卢永祥经由日本来到奉天，由我们奉军护送南回。行军途中，我听到卢氏左右讲述浙沪作战经过颇详，这里约略叙述其中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键所在。

据说战事初期，陈乐山所部在宜兴方面，何丰林所部在上海附近，都打得很好，而且占了优势。失败原因在于怀疑浙军通敌，过早放弃浙江。卢、何军队的部署是将自己嫡系的军队全部用来对苏对皖，而以浙军潘国纲所部用作对闽对赣。因为事前估计闽、赣方面不至于很快就有激烈的战斗，可是出乎意料，孙传芳亲率福建军队联合江西军队很快就占领庆元，接着又占领衢州，浙军节节败退，杭垣不稳，因此怀疑浙军全部通敌。而杭州城内又无亲信军队，乃仓猝离杭，并将陈乐山所部由宜兴撤至嘉兴，用以保护上海。这实际就是放弃了浙江，战局由此逆转，并且一蹶不振，终于无可挽回。其实，浙军通敌的只是当时的警察厅长夏超和很少一部分军队，面

张载扬和潘国纲所部浙军，极大部分并未通敌。所以当时只要沉着应付，浙江的局面还不是没有可为的。这当中重要的失着是杭州没有留置亲信的部队，因而一闻风声就仓惶退出，造成过早放弃浙江的严重错误，否则战事可能支持到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决战胜负分晓的时候。我们大家相谈之下，都觉得很可惜。

与江浙战争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先后曾由樊钟秀所部和程潜所部一度攻入江西的南部和湖南的宜章。不过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的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战果是不大的。但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湘、赣，而且川、滇、黔各省亦有所牵动，声势浩大，与卢、何同样，也牵制了长江以南曹、吴方面的很多军队。

直奉两军的部署和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激战

我们翻开旧的地图，可以看到，由奉天进关不外两条路：一条是进山海关，另一条是出热河。山海关一路较近，较平坦，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交通运输颇为便利，这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出热河之线，可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就是由北镇出朝阳，经凌源进喜峰口。这一路较远，交通运输亦较困难，但无论攻守，俱甚重要。因为对方若以重兵出朝阳，可以威胁锦州，使我锦州以下全军陷于绝境。北路就是由通辽出开鲁，经赤峰南下承德，或西至多伦，再进喜峰口以西各口。这是最远的一路，交通运输亦最困难，不过可以利用骑兵，也并不是没有可为的。

当时我军的战略，是集结主力的极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却先从热河方面攻击前进，预定待热河方面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然后在此发动主力进攻，以期三路齐头并进。我们采取这个战略，一则是因为当时热河方面的敌军较为空虚，二则为了预防敌军以重兵出朝阳断我后路，所以来一个出其不意，先发制人。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我方作战部队共分六军，部署如下：(1)第

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两军共五个旅，外加骑炮各一团，共十四个团，约五万余人，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2)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共七个团，约三万人，担任热河南路。(3)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阚朝玺，共六个团，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4)第五军军长吴俊升，第六军军长许兰州，副军长吴光新，以骑兵为主，担任热河北路。这个部署很显明，一、三两军是整个战略的重点，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决战。

针对我军的部署，吴佩孚除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和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外，其作战部队分为三军：(1)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统率曹吴嫡系主力的极大部分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我军的主力。(2)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原驻热河各军对抗我热河南路的进军。(3)以冯玉祥及其所部为第三军，应付热河北路。同时以曹錕、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分别统率直、鲁、豫、鄂、陕、川等各省援军，并以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

上面说过，我军战略是先从热河攻击前进，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就发动山海关方面的主力进攻。热河方面，我乘敌援军未到而原驻各军力薄的机会，以破竹之势于9月下旬即占领开鲁、朝阳，并于10月初旬直逼凌源、赤峰，与我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遂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敌我两军的主力大战。

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实际是两个战场：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我军由郭松龄指挥第二、第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韩麟春指挥第四、第十六两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另由一、三两军成立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以第十二旅三个团作为联军预备队。联军指挥部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我就在联军指挥部内担任作战科主

任之职。我的职务原是对全线各段兵力的分配、部署和前进路线等作出初步安排，但在实际上，我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地形的侦察上。这是因为事前敌我两军划地分防，双方都只能在自己防地内测绘地图。这样，两方面的地图就接不上，要确定兵力分配和前进路线均有困难，所以不能不随时利用飞机经常在敌方上空盘旋侦察。说来惭愧，在山海关正面，我们自己没有可用的地图，倒是日本驻军却有二万五千分之一的精密地图，我们还借用了他们的。不过他们也只能借给我们查看查看，想要把它翻印就不答应了。

我还记得我们这一线是从10月初开始进攻的，一开始就用炽盛炮火全线猛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山海关正面比较平坦，而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则山岭连绵不绝，因此我们原期望山海关正面能先得手，所以这方面兵力配备最多，战斗最激烈，而伤亡也最重。结果反面是九门口以北约三千米的黄土岭口首先突破，而山海关正面的敌军阵地则固若磐石，始终未能攻破。这件事引起我们指挥部内大家的热烈讨论。当时我们知道对方作战官兵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部队，尤其是详细知道对方在指挥作战上负实际责任的参谋长是陆大毕业、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麟。可是我军作战部队也并不弱，全是久经训练，装备优良，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最精锐的部队。对方究竟是凭了什么能如此坚不可破呢？当时我们得不出结论。事后清理战场，加以分析研究，才知道山海关正面虽然地形比较平坦，看去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险要，但正可以利用倾斜缓慢的地形，发挥炽盛火力，彻底侧防消灭死角；加以散兵壕上掩盖坚固，顶得住我方炮火猛轰，使我步兵无法接近，因此看去易攻难守，实际却反而易守难攻。与此相反，九门口以北以西山岭连绵不绝，看去地形险要，运动困难，实际却是山岭愈高，死角愈大，小路山口愈多，步兵易于接近，只要分成数队，分进合击，是可以突破的。